



还有多少终身制需要打破

2012年教师节前夕,上海市教委传来消息——从今年开始,上海中小学教师资格在首次注册后将不再是终身制。另据了解,今后北京教师资格也将不再享有“终身制”,取而代之的是5年时限。9月9日,北京市教委表示,已经接到教育部的有关文件,北京今后也将进行教师资格定期认证注册制度,逐步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制。

打破教师终身制并未新闻,此前,江苏等省的一些地方已经实行,而上海甚至打破了教授终身制——教授不再搞终身,教授职称不是由专业委员会评定,而是由学校专门的聘任委员会评定并聘任,任期为三年。打破终身制的积极意义在于,就像是在教师头顶悬上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教师的资格并非一劳

逸,而是定期更新,这有利于检验教师的职业素质,敦促其改进和提高,否则便失去为人师表资格。但是,还得考虑这会不会加重老师的负担,对老师的资格认定与考核,是机械的条条框框和权力的好恶,还是学生的评价?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这会不会产生逆淘汰,那些懂创新、有思想、有公民精神的老教师被借故剥夺教师资格?正如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谭和在在微博中担忧道,这将演变为对教师自主精神的制约与自由权利的剥夺,官方意志乘机在审查中发威,极有可能是听不听话的教师就清除,且不说是有关部门还将借此发财。这是一家之言,但如此考虑值得。放眼当下,我国教师队伍虽

然参差不齐,但在教师较为短缺的语境中,教师其实并不是最需要打破终身制的职业。教师要打破终身制,公务员是不是也应该打破终身制?尽管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尝试推行公务员聘任制,但毕竟未成“气候”,公务员淘汰率极低,一旦考上公务员就相当于端上铁饭碗甚至金饭碗。统计显示,我国每年正常被辞退的公务员占总数的比例为0.05%左右,而一般正常企业的淘汰率在5%到15%之间。一旦当上了公务员,只要不违法犯罪几乎就高枕无忧,这显然会加剧公务员队伍膨胀。因此,公务员更需要打破终身制,加大淘汰率,势在必行。

除了公务员,院士也应该打破终身制,建立退出机制。“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院士是我国科技界的最高学术称号,院士应该为人高山仰止,无论是学术造诣还是道德文章都可圈可点,但现实中一些院士过于食利化、商业化,甚至道德有亏,但由于院士具有终身制的“豁免”资格,罕有弊端院士为之付出代价。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我国院士制度建立至今,只有中国科学院的两个院士被劝退,分别因经济或政治问题,从来没有院士因为科学道德而被除名。很显然,院士也应该打破终身制。

除了公务员、院士应该打破终身制,一些红头文件、超期“服役”的权力也应该及时退出。按说,红头文件本来应该有实行期限的,但不少红头文件仿佛没有生命的终点,具有了终身制的特权。此前,湖南、山东等地打破红头文件的终身制,出台省级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立法,比如山东规定,规范性文件应当载明有效期限和施行日期,有效期为3年至5年,标注“暂行”、“试行”的,有效期为1年至2年。有效期届满自动失效。此举被称为“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中的一大制度创新”。诚然,红头文件就该有期限,到期了就该废止,这是规范行政权力的需要,也是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

不是所有的终身制都要打破,比如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就没有终点可言。终身制,无论是打破还是不打破,其立足点应该是有益的,能维护公共利益的,能激发社会活力的。还有多少终身制需要打破? □王石川



如此办学

为某校新生入学自带课桌画像

画朱慧卿 诗张雅西

肩扛车驮,全为课桌。有桌入学,无桌歇着。嘴上花朵,暗地掠夺。究其因果,财力短缺。如此办学,大错特错……

2012年年初,双独生子女的小郭和小郭夫妇生下第二胎。4月,夫妇俩收到计生局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决定书称他们生二胎未经批准,要征7万元社会抚养费。9月初,他们在法院强制执行下交了7万元。当地法官称,符合生二胎但未批准生育的,仍要征收抚养费。

既然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符合生育二胎条件也必须经过批准才能生,否则就得按规定接受处罚,双独夫妻被征收7万社会抚养费,虽然其境遇值得同

“社会抚养费”亟待规范公开

情,倒也无可厚非。可案情一经媒体披露,还是迅速引来无数围观者,并且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从喧嚣的网络舆情不难看出,大家已经超越了对个体命运的关注,而纠结着多重层面的关切和焦虑。一段时期以来,独生子女家庭、双独家庭问题受到包括广大民众在内的有关各方广泛关注,特别是失独家庭的命运更令

人陷于苦恼和迷惘之中,鉴于这是特殊国策的“副产品”,大家普遍希望政府在政策层面有所作为。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小郭、小郭双独夫妻受处罚,人们于政策、法规的合理性之外,追问得更多的是政府对失独父母关心、反哺、补偿多少,长期以来计生罚款或社会抚养费到底去向哪里?有多少真正用在了

与“社会抚养”相关的领域,真正体现出制度应有的温度? 计生部门执法简单粗暴现象,一直备受诟病,双独家庭无证生二胎被强征社会抚养费引发的质疑,更让大家清楚地看到,提升计生执法水平,规范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使用,推进透明公开,加强制度约束和社会监督,委实刻不容缓。 □佚名

DUSHU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小说《白鹿原》无疑具有重要地位。2012年,电影《白鹿原》经过重重困难与考验,终于得以公映。20年,是什么情怀让白鹿原始终牵动着人们的内心?在《白鹿原》创作过程中,陈忠实经历了怎样的自我蜕变?对于电影《白鹿原》,原作者是否感到满意?陈忠实又是如何评价被电影具象化后的小说人物?

近日,《杨澜访谈录》踏上关中土地,与著名作家陈忠实一番畅谈,为我们讲述了白鹿原的情怀。

小说到电影,白鹿原精神依旧

将小说《白鹿原》改编成电影,包括张艺谋、陈凯歌在内的许多导演都曾有过这个想法,原本合作已谈得很深入了,却因种种原因,最终不了了之。

我最希望电影导演和编剧能理解我这部小说的用心,希望能真实展现出小说描写的时代,

怕传出什么闲话来,那时就是这么封建。所以我开始写小说时,也就刻意回避对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描写。但写《白鹿原》时,尤其写到田小娥时,想到田小娥的精神和心理所背负的重担,便下了决心,决定不再回避爱情描写,不仅不回避,而且还要撕开写,要撕开我们传统封建文化中最腐朽的黑幕,要写得透彻。至于说不做诱饵,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描写男女之间的事情,只是为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服务,而绝不能作为吸引读者的诱饵。

为自己写一本“巨作”

之所以要写《白鹿原》,因为我一生喜爱文学、喜爱写作,将业余爱好写作转向了专业创作,已经大半生了,总想应该给自己一个交代。

一次,和朋友聊起《白鹿原》构思时,我借着酒劲儿说,希望能够为自己写一本垫棺作枕的

从“4元钱闯北大”里读懂中国

到北大又花了1毛5,身上就剩三块七了,我在学长的带领下,去买了个饭盒,可却没带钱买饭票了。”当时周其凤向学长借钱买了饭票,然后到北大的助学金发放部门,领了第一个月的生活费。

“4元钱闯北大”有着很强的时代烙印,也是当时众多大学生报到的写照。在“4元钱闯北大”里,我们读出了一个时代的贫困,也读出了一个年轻人的坚强与独立、乐观与向上。场景转换到今天,现在不少大学生报到,相随的是大人小孩、大车小车、大包小包,这种“豪华报到”与周其凤当初的“4元钱报到”形成了鲜明对比。今天,要求大学生再像周其凤当年一样“寒酸报到”,多少显得有些不通人情、不近烟火。但是,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坚强和独

立的品质永不过时。周其凤“4元钱闯北大”的精神价值就在这里。虽然时代变了,但“4元钱闯北大”里的坚强与独立永不过时。这一意义上,“4元钱闯北大”是一堂很好的“开学第一课”。“4元钱闯北大”,只是大学的开始,从这里开始,读懂人生、读懂中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毛建国

翻译家孔保尔新译《挖掘》出版

由翻译家孔保尔翻译的英国女作家贝琳达·鲍尔的长篇小说《挖掘》近日由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新星出版社出版并向全国发行。孔保尔于2010年5月受新星出版社的邀请,历时五个月完成了这部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忠实说,《挖掘》这部小说用奇特的构思,讲述一个受尽磨难、十二岁少年与连环杀手进行生死斗争的故事,它向人们敲响了保护好自家孩子的警钟。

《挖掘》于2010年3月由英国兰登出版集团出版,2010年11月获得英国作家协会金匕首奖。

《挖掘》一书的译者孔保尔是西安电视台制片人,中国翻译协会会员。

小说《挖掘》讲述了一个十二岁男孩和一个连环杀人恶魔之间的猫和老鼠危险游戏的故事。主人公斯蒂文从未谋面的舅舅比利十一岁时被专门奸杀儿童的连环杀手阿诺德杀害,死不见尸。斯蒂文的奶奶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亡,日复一日站在早已支离破碎的家门口等待儿子回家。斯蒂文决心找到比利的尸骨,以填平自己家庭那道黑暗的裂痕。于是他写信给狱中的阿诺德,向他询问比例尸体的下落。

一个绝望的孩子和一个无聊的囚犯之间的猫鼠游戏使这个故事跌宕起伏,最后,当阿诺德发现写信人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时,一个疯狂的想法在他脑子里应运而生。 □余合

陈忠实:《白鹿原》灵感来自幻听

以及白鹿原上人们的精神和心路历程。

对于现在这个电影,主要人物白嘉轩和田小娥的表演又好又不好。好的是看到小说里的细节得到形象化表现,感到心中一震,至于不好,并不是演员演得不好,而是小说写作可以给读者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放到电影上就显得太直观了。当然,这也可以理解,电影只能具象化。

我是一口气看完三个半小时的《白鹿原》电影的,一点也不感觉累,整体上说,电影改编得好。

十字忠告,只为大胆创作

创作《白鹿原》这部小说时,我曾经给自己写过一张小纸条,上面有十个字——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

因为我们年轻时,社会风气比较保守,对男女问题特别敏感,那时我在农村基层当干部,办公室里如果来个女同志,门一定要开着,让大家都能看到,生

书。有一天我去去世了,棺材里放这么一本书,也就够了,不管它是否会对世界产生影响,只要能让自己满意,能对自己喜爱文学这大半辈子。

为了写《白鹿原》,我四处奔走,查阅史料,历时4年,才终于写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十分痛苦的自我剥离,对我们这代作家来说,这并不是件容易事,毕竟过去只能写假大空的东西,从假大空回归到生活真实、艺术真实,这就要从极“左”的文学理念转向真正的文学理念,真是非常艰难,要靠不断读书和不断对生活,慢慢把自己剥离出来。

《白鹿原》的灵感来自幻听

为什么我要写《白鹿原》?这来自我幼年时的一次幻听。那时我还不懂事,有一次晚上在房里,突然无来由地听到一个爷爷辈的人的呻吟声。以后,这声音不断在我的记忆徘徊,引起了我的好奇。所以《白鹿原》的背景,恰好是我爷爷辈生活的那个时代,在写作中,我好像突

然就能够体会到那个呻吟者的内心,而感触也与幼年时完全不一样了。这个触动让我仿佛找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那种声音大概只能在那个时代里,一个老年人在深夜无意识之间才会发出,白嘉轩到末年,大概晚上也会发出这种无意识的呻吟。

七个女人奠定小说回忆基调

对每一个作家来说,“虎头”和“豹尾”同等重要,一个好的开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部作品能否赢得大家关注。《白鹿原》的开头显然会引起读者的好奇心:是怎样的一个男人,能够在一生娶了七个女人。

这个开头经过了再三思考,这样一个句子,表现的是白嘉轩在晚年时回忆的口吻,因此它不仅是一个开头,更奠定了整

制度,更是要让女性也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话题。

“我可以不养鸡了”

四年磨一剑,终于磨出了不养鸡了。写完《白鹿原》时,我已经50岁,在我的观念中,50岁已经是老年了,如果自己呕心沥血的《白鹿原》无法出版,我真会考虑将写作再变成业余爱好,不再专业干它。

最喜欢关中的妻子

我在农村生活了半辈子,如果说最喜欢的,就是关中的妻子。

对《白鹿原》乃至对整片关中平原而言,妻子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年轻时在农村,一到割麦子时节,大家都得下地,因为就抢那10几天,所谓“麦黄一响,蚕老一时”,若是不赶紧割,遇到一场风雨,忙活一年的辛苦就全白费了。那时学校也放假,老师都去抢收,学生们也下地捡麦穗。关中人割麦和各地不太一样,看上去不紧不慢,其实割起来速度很快,一会儿就一大片。割麦子这活儿是非常辛苦的,辛苦到什么程度?就是再累也不

能休息,否则一坐下,立刻倒头睡去。

在农村,撒麦种是一个技术活,一村也就两三人,你看撒种人似乎是随手一撒,可撒出的麦种却非常均匀,一到撒种季节,各家都会请“把式们”来帮忙,他们撒种姿势非常优美,就像舞蹈一样。

最在意的读者是父亲

我最在意、最畏惧的读者是自己的老父亲。当初父亲还不觉得我是作家时,读过几篇我的短篇小说,他直接批评说“没《三国演义》好看”,你想想,我上世纪80年代初写的那些短篇,怎么可能跟《三国演义》比呢?我父亲在那时也算是文化人,常常自己找剧本来研究,对文学也有着自我的见解,认为小说就应该写得让大家觉得好看。老父亲看《三国演义》百看不厌,所以才会拿我的小说与他相比。遗憾的是,老人家没能看到《白鹿原》的出版。 □傅铭